

蘸过鸡血的纸钱后,抽出鸡胫骨,刮净上面的筋膜,露出血窍,再用削好的竹签或仙人掌刺洑洞的走向插入血窍,用食指和拇指卡住胫骨的两头,使胫骨内弧处紧靠,鸡骨和上面的签就构成一个卦像。最后,布摩或长者再三验视并作出解释。还有一种方法是取刚会鸣的雄鸡一只,杀死后立即折断翅膀,剔除皮肉,视翅骨的纹路,若清晰明亮主吉,暗淡模糊主凶。”^{[3]131-132}从杨宗亮先生所述我们得知,作为越人后裔的壮族人中仍行“鸡卜”,就其中的取鸡腿骨进行占卜而言,大体分为下面几个步骤:其一,择取健壮体完的公鸡;其二,巫师祷祝;其三,将公鸡杀死煮熟而巫师再行诵经;最后巫师抽取鸡腿骨卦象并行占卜。返观前文所述张守节《正义》中鸡卜的四个程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天壮族所行“鸡腿骨卜”的运作过程与张守节《正义》中鸡卜的四个程式是极其吻合的;而今天仍在壮族地区存留并流行的鸡骨卜方法中或以腿骨或以翅骨,而断无取“鸡两眼骨”进行占卜之法,因而,我们可以推测:张守节《正义》中“眼”字恐为“腿”字在文本传抄过程中致误或版刻漫漶不清而讹作“眼”。若此,则张守节《正义》中关于“鸡卜”的解释就应当是“独取鸡两腿骨”进

行占卜了。

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史记正义》对“鸡卜”的解释当是取鸡两“腿骨”以成卦象而非“眼骨”,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中鸡卜之“独取鸡两眼骨”之“眼”当是“腿”之形近的误文,若此,则依中华书局标点本文例,其中的《正义》之文当为:“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腿]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而用鸡两腿骨进行占卜不仅有文献根据,且与相传至今的越人及其后裔壮族人中的“鸡卜”习俗更是如合符契。

[责任编辑 乔林晓]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汪维辉.史记标点商榷[J].古汉语研究.1992(4).
[3]杨宗亮.壮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唐代胜州转运的设置 ——读敦煌所出《唐开元水部式》残卷

任艳艳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8)05-0123-03

伯希和2507号文书残存唐《开元水部式》,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利法典。包括农田水利管理,碾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航运船闸和桥梁渡口的管理和维修,渔业管理以及城市水道管理等诸项内容,国内外学者对此多加著述校释或引用论证,不拟详举。此仅对残卷所述胜州转运水手问题,参考相关的史籍文献记载略加考释,以期有助于加深对

唐代水陆运使和兵役制度演变的认识。

一、胜州转运水手的建置

水部式残卷62-66行关于胜州转运水手的记载,摘录如下^①。

62.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取

收稿日期:2007-12-03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第3分册,1913年,又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五),台湾文华出版公司影印1970年版。仁井田陞:《敦煌发现唐代水部式的研究》,《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1936,复收入《中国法制史研究》(IV)《法と慣习·法と道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1936,4-7。那波利贞:《唐代の农田水利に関する规定に就きて》,《史学杂志》,1943年,第54号。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57年版。佐藤武敏:《敦煌发现唐代水部式残卷译注——唐代水利史料研究(二)》,《中国水利史研究》1967,2。王永兴:《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勋官充。

63. 不足, 兼取白丁, 并二年与替。其勋官, 每年赐勋一

64. 转, 赐绢三疋, 布三端, 以当州应入京钱物充。其白

65. 丁充者, 应免课役, 及资助并准海运水手例, 不愿

66. 代者听之。”

胜州转运水手的记载不见他处, 因此水部式残卷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的转运制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我们知道转运使是在唐开元年间开始设置的, 何汝泉先生对唐代转运使曾作比较系统的研究^[2], 但是可能由于资料和内容所限, 胜州转运水手的问题并没有涉及。

《旧唐书》卷三十八: “胜州下都督府, 隋置胜州, 大业为榆林郡, 武德中平梁师都, 复置胜州, 天宝元年复为榆林郡, 乾元元年复为是胜州, 领县二户四千一百八十七, 口二万九千五十二, 去京师一千八百三十里, 至东都一千九百五里。”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 “隋文帝开皇三年於此置榆林关, 七年又置榆林县, 属云州。二十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县, 置胜州, 立嘉名也。炀帝大业五年, 以胜州为榆林郡, 领榆林、富昌、金河三县。十五年, 郡人郭子和以城入突厥。武德四年, 郭子和归国, 其地又陷梁师都。贞观二年, 平师都, 三年仍隋旧理置胜州。时柴绍、刘兰破灭匈奴, 夺得河南之地, 因置州, 以决胜为名。”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八: “隋文帝开皇二年置榆林, 成七年, 又置榆林县, 属云州, 二十年割云州之榆林、富昌、金河三县, 置胜州。大业五年以胜州为榆林郡, 十年郡人郭子和以城入突厥, 唐武德四年郭子和归国, 其地又陷梁师都, 唐贞观三年平之, 五年仍於隋旧理置州, 时柴绍、刘兰等破灭匈奴, 夺其河南之地, 因置胜州, 天宝元年改榆林郡, 乾元元年复为胜州。胜州西北至河十里, 正东至河四十里。”

唐建胜州的时间有三种说法, 《旧唐书》为武德中, 《元和郡县图志》为贞观三年, 《太平寰宇记》为贞观五年置州, 三者记载都和唐平定梁师都事件有关。拟待另文考述。

胜州的地理位置, 严耕望先生已有详细的考订。胜州既位于黄河向南大转弯处, 南下可达都城长安, 东去河东道, 西至中受降城, 北临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活动的蒙古草原, 地理位置险要, 水、陆路交通又非常便捷, 为了捍卫唐王室, 曾在此设关隘, 屯重兵, 因而成为唐代北界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

《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 “榆林郡, 开皇二十年置胜州。金河, 开皇三年……置榆关总管, 五年改置云州总管。二十年, 云州移, 县废, 仁寿二年又置金河县, 带关。”

《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 “胜州榆林郡, 下都督府。有义勇军。……榆林, 东有榆林关, 贞观十三年置。河滨,

东北有河滨关, 贞观七年置。”

唐初的转运有两种, 一是转运到京师供御用, 一是转运至边地供军用, 都由各州差纲运输。漕运是由中央政府户部的度支司管理。开元时, 转运开始从六部职掌中分离出来, 专设官员掌管, 漕官也由度支郎中、员外郎变为运使、转运使。胜州转运无疑是供边军的漕运, 而考史籍, 没有胜州运使或转运使的记载, 可见胜州转运只是转运使院下属的一个机构部门, 那么它是属于哪个部门的统辖呢?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朔方节度使, 治灵州, 管盐、夏、绥、银、宥、丰、会、麟、胜、单于府等州。”

《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 “(开元) 九年, 置朔方节度使, 领单于大都护府, 夏、盐、绥、银、丰、胜六州, 定远、丰安二军, 东、中、西三受降城。”

开元年间, 胜州属于朔方节度使管辖, 因此胜州水运点也应该是归属于朔方道。

《唐会要》卷七十八《节度使》: “朔方节度使, 开元元年十月六日敕: ‘朔方行军大总管, 宜准诸道例, 改为朔方节度使, 其经略、定远、丰安军, 西、中受降城、单于、丰、胜、灵、夏、盐、银、匡、长、安乐等州, 并受节度。’……二十九年, 除王忠嗣, 又加水运使。”开元二十九年胜州转运水手即应该下辖于朔方道水运使。又《全唐文》卷三三, 玄宗《以李林甫兼领朔方节度诏》: 天宝十载, 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 其衔有六城水运使。可能朔方道水运使即后来的六城水运使。丸桥充拓先生指出朔方道水陆运使的情况由于没有其他发现, 在这之前的状况还不能确定, 但是“水陆运使”一职最早是开元二年的陕州水陆运使, 朔方道水陆运使的设置当然也是开元年间的事情。进而考证这个朔方道水陆运使在开元二十年初由胜州长史兼掌, 但此后不久, 即改称六城水运使, 且由灵州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使兼领了^{[3][41]}。在胜州设置有北边漕运的事情是肯定的, 由这一条可以看出, 朔方道节度使权力的扩大, 因为无论水运使还是六城水运使, 都是由朔方节度使担任; 权力的扩大进而表明了唐代北边军需的紧张。

二、从胜州转运看唐代兵役制的变迁

设置胜州水运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便利的黄河水运来解决北方诸驻军的军需粮食物资问题。《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称: “初, 度支岁市粮于北都, 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 费钱五六十万缗, 溯河舟溺甚众。”最初指的是建中以前。此后宰相杨炎有屯田丰州之议, “振武、天德良田, 广袤千里,”此说不免有夸张之处, 况且这更说明了边军粮食的严重短缺。韩愈《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治所序》云: “(元和) 六年冬, 振武军吏, 走驿诣阙告饥。公卿廷议, 以转运使不得其人, 宜选才干之士往换之。吾族子重华, 适当其任。”^[4]在宪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八《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华民国七十四年(1985年)发行, 第287页。“胜州北至黄河五里, 东至黄河四十里, 去今山西朔县四百二十里; 东北至黄河十里, 去今山西大同县四百里; 南至麟州即今陕西神木县四百里; 西北至黄河二十里, 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 而胜州城则在黄河东流折而南流处之, 大转弯内。”

宗元和初,就由代北水运使韩重华置屯田,“开废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岁收粟二十万石。”^[9]《山西通志》卷三十四称:“韩重华屯田,东起振武,转而西极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昔人谓黄河在他处为害,在宁夏独为利。”虽然军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驻军的粮食问题,但是水运并未因此而罢废。

胜州转运水手的职责之一是给边军运输军粮。

《全唐文》卷七百五,李德裕《条疏边上事宜状》:

“访闻麟胜两州中间,地名富谷,人民殷繁,盖藏甚实。望令度支拣干事有才充和余使,及秋收,就此和余,于所在贮蓄。且以和余为名,兼令与节度使潜计会设备。万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军运粮使。胜州隔河去东受降城十里,自东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粮,东可以壮振武,西可以救天德,所冀事先布置,即免临时劳扰。”

胜州转运供应振武军和天德军的军用储粮由此可知。

唐前后期不仅关内的粮食物资很大程度是来源于河东,《旧唐书》卷二《太宗上》称:“武德元年,太宗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载:“咸亨三年,关中饥,监察御使王师顺奏请运晋绛仓粟以贍之,上委以漕运。河渭之间,舟楫相继。”《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及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由于胜州和河东道便利的交通关系,我们推测胜州转运的粮食物资等一部分很可能也来自河东。况且,据伯希和 2507 号文书,“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即使是从事胜州转运的水手也都来自河东。

胜州转运水手的职责之二是运输盐。

《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称:“胡落池,近在丰州界,隶河东供军使。每年采盐约一万四千余石,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项叛扰,馈运不通,供军使请权市河东白池盐供食。”《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同。胡落盐池盐供应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到大历四年后,就转由河东白池盐供给。《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大历十二年“五月,辛亥,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按官健是招募兵,而不是文书中的色役或纳资代役。文书所记:“取勋官充,不足,兼取白丁。其白丁充者,应免课役,及资助并准海运水手例,不愿代者听之。”这种变化体现了唐代兵役、徭役制度的变迁,这种制度的变迁唐长孺先生早有详细的辩证^{[9]278-314,405-428},从胜州转运水手到水运官健的变迁可作具体的实证补充。

敦煌《朋友书仪》之《十二月相辩文》^{[7]49-55},作者“离家弃梓,远役边州,“朔塞相思,悬心更远。”“虽复恒餐鱼米,

犹寻晋地之风。”“边城日远,塞外年深。”“但谓家之衣纓,长居兵役,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作者是从晋地远赴塞外朔方从事水运兵役。具体在什么地方服役?“十月孟冬,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足风尘。黄河带九曲之源,三堡接斜川之岭。边城汉月,切长乐之行人,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十一月仲冬,兰蓬绝径,芦苇侵天;惟舟行人,能不凄怆。”“十二月季冬,望丰州之乡邑,地多运暮之营,看胜部之川源,北连烽戍,兵旗遍野,戎马朝嘶。……丰州土地与晋邑之不同……榆多役士,长宣胜府之忧,宁远行人,镇抱丰都之根。”书仪作者正是从河东晋州充胜州水手。这不仅说明《水部式》“胜州转运水手条”在实践中执行,而且通过“地多运暮之营”,“暮”疑为募,可以看到唐代兵制已由征兵制转变到募兵制。兵役期限也从“二年与替”的两年役期变成“边城日远,塞外年深……但谓家之衣纓,长居兵役”的长期兵役制。

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自晋绛二州,开元时期还保持“宜二年与替”的两年色役制,极大的增进了河东晋绛之士和胜州的交往。《朋友书仪》晋绛募士多年服役在外,两年役期遭到破坏,胜、丰等州集聚了大量的募兵,“兵旗遍野,戎马朝嘶,”导致胜州府也对这些长期服役在外的兵士感到担忧。可以推测远募胜州的兵士中有不少定居在朔方塞外。长期在胜、丰等地的生活,加剧了他们对河东故土的思念,也促进了胜州、河东间的交流。

《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一:“榆林,汉沙南县地,属云中郡。……隋开皇六年,置榆林县,寻为胜州治。唐因之。五代梁贞明二年,契丹阿保机破振武军。胜州之民皆趣河东。”胜州之民都迁往河东,不仅是由于其地接近河东,而且也是长期以来交往的继续。

[责任编辑 乔林晓]

参考文献:

- [1]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何汝泉.唐代转运使初探[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3]丸桥充拓.唐代后半の北边财政[J].东洋史研究,第五十五卷第一号,平成八年六月(1996).
- [4]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二一[M].上海:世界书局,1935.
-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九:卢坦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 [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7]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附录《朋友书仪》一卷[J].敦煌研究,1987(4).